

杂谈“生挽”

●沈 栖

查百度“挽联”的定义是：“哀悼死者、治丧祭祀时专用的对联。”这一界定似有绝对化之虞。因为有些人在生前就自撰或请他人写下挽联，此为“生挽”。“生挽”者大都出于某种情愫：或感慨于自己的身世遭遇，自嘲自讽；或嫉世愤俗，以激后人；或总结平生抒怀述志。

“生挽”首先体现的是一个人即将走到生命终点前的一种自我评价，摒弃夸饰的谀词和入俗的套语。如罗振玉自写的生挽：“毕世寝馈书丛，得观洹水遗文，西陲坠简，鸿都石刻，柱下秘藏，抱残守缺，不幸；半生沉沦桑海，溯自辛亥乘桴，乙丑扈蹕，壬申于役，丁丑乞身，补天浴日竟何成。”这位杰出的学者一世功名一览无余地隐现其间。1922年，在京沪报界举办的“最景仰之成功人物”民意测验中，南通张謇以最高票数当选，然而作为一个智者，张謇颇有自知之明。且看他在生圻墓（生前预设的墓地）门上自撰的挽联：“即此粗完一生事，会须身伴五山灵。”联语用词朴实无华、平稳简要，但包蕴的内涵极其丰富：回首平生，既有一生事业的大体完成，死而无憾矣；又有谦卑自抑，仅仅是“粗完”而已。人生如此，可坦然辞世，回归自然、与秀美的五山长相依伴。这恰恰反映出这位晚清思想家、实业家严谨的态度。当然了，也有自我标榜、欺世惑众的“生挽”，如袁世凯自挽：“为日本去一大敌，看中国再造共和。”

“生挽”还是临终者心迹的一种曲折流露。某些功过参半、是非蜂起的人物，往往带着满腹怨恨离开人间，怕死后受到非议，生前便写下“生挽”给自己来个历史定位。如一代老臣翁同龢为甲午战争、戊戌变法殉情，他岂止是死在了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里，还死在了顺我者昌、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里，死在了垂死挣扎的封建专制体制里。弥留之际，翁同龢以《论语》集句给自己撰写了一副挽联：“朝闻道夕死可矣，今而后吾知免夫。”让人代笔高悬于堂前，尔后饮恨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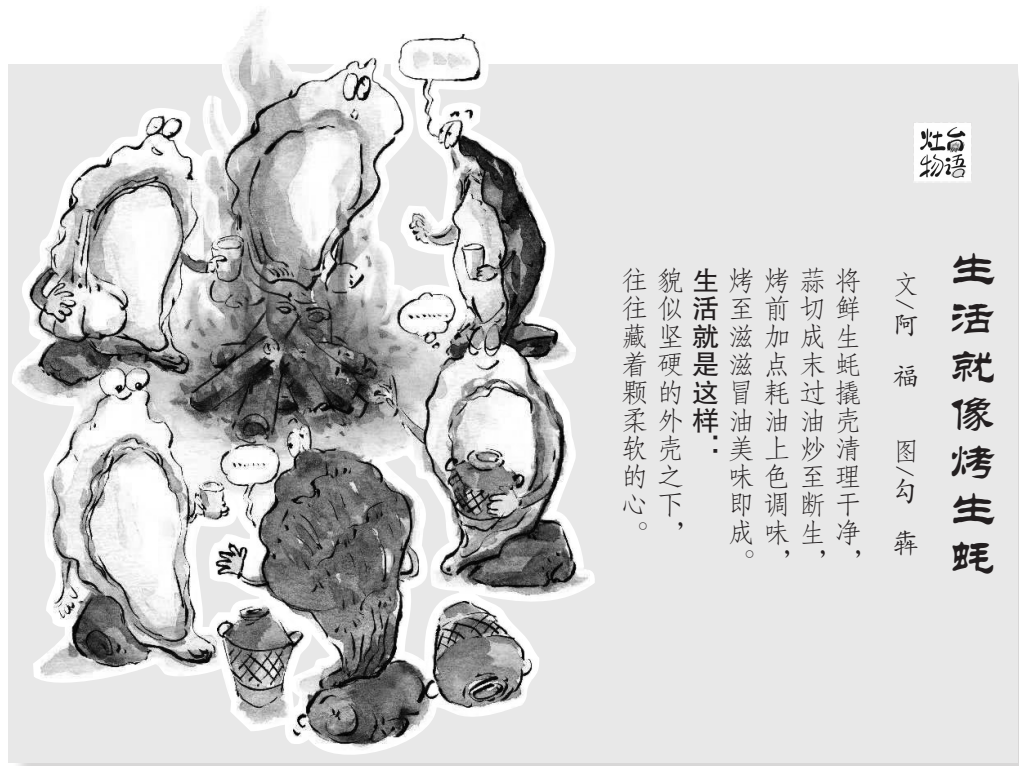
逝。真是：一笔长横写清苦，一笔斜点书悲伤，一笔卧钩画凄凉！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些历史名人系万千风云与时代风潮于一身，临终前常有反思。其“生挽”不奢望文化包装，图的是给个人的精神版图上留下清晰而简洁的人生轨迹。如杨度经历晚清至民国，周旋于各种政治要人之间，从湖湘秀才到宪制专家，从“筹安会”六君子之首到帝制罪魁祸首，从学佛居士到中共党员，一生映射出那个时代的衰世乱象及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变。1931年9月17日，杨度在上海法租界寓所去世，临终前写下“生挽”：“帝道真知，如今都成过去事；医民救国，继起自有后来人。”很显然，杨度的“生挽”总结了自己跌宕的一生：上联是对自己前半生言简意赅的归纳，并断然予以否定之；下联则是步入晚暮时的觉醒，他把“医民救国”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，满怀激情展望中华民族的复兴愿景。至于秋瑾在就义前五日写的自挽联“不须三尺孤坟，中国已无干净土；好持一杯鲁酒，他年共唱摆伦歌。”惟妙惟肖地道出了这位鉴湖女侠为伸张女权而奋斗、为革命建国而努力的心迹。

追悼会，往往是一次挽联的PK，一次披麻戴孝的雅集。但在民国时期，文人间常有“生挽”的文字游戏。郑逸梅素有“无白不郑补”之誉。他基于这一考虑：若然死去，即便挽联如云，称颂有加，也是无幸有睹，何不提前览之为快？于是，郑逸梅登报求挽，一时诸文友纷纷赐其哀挽诗联。如南社同仁高吹万寄赠的“生挽”：“写稿厌烦，人间欲谢垂青友；修文被征召，地下仍封补白王。”同属“鸳鸯蝴蝶派”的作家周瘦鹃给其“生挽”：“输君妙笔吐奇葩；补白称王亦足夸。”郑逸梅据此写了《生生死死录》一文，生动记述了当年友人替他撰写“生挽”的盛况和自己读这些“生挽”的真情感受，充分彰显出两者情感上的契合和道德上的认同。



以史为鉴



灶台物语

生活就像烤生蚝

文/阿福 图/勾犇

将鲜生蚝撬壳清理干净，蒜切成末，过油炒至断生，烤前加点耗油上色调味，烤至滋滋冒油美味即成。生活就是这样：貌似坚硬的外壳之下，往往藏着颗柔软的心。



茗香心素

杨树山

六十而退

●荆山客

子曰：三十而立……六十耳顺。我三十没能立，六十倒是耳顺了。因为耳朵重听，悄悄话根本听不见，想不听耳顺都不可能。这样很好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听不见心更静。

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在他八十一岁寿辰的时候出了一本书，书名叫《八十而立》。老先生谦虚，他在自序中说：“就以八十为界吧，八十年拼搏虽未能大立，但总算站起来了。这站的过程也很漫长，把一些零星见闻作点记录，供人茶余酒后消闲解闷，也算一立吧。”其实邓先生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以小说《在悬崖上》一举成名，并因此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，那是何等风光。若按孔子“三十而立”的说法邓先生还早“立”了五年呢。以后的情形地球人都知道，他被打翻在地，又不知被踏了多少脚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，邓先生才以《烟壶》《那五》等一系列新京派经典小说重立文坛，这一次“立”大发了，天下无人不识君。以邓先生在中国文坛的名望和地位，八十岁了，还笔耕不辍，竟要以八十为界，再行“立言”之责，真是太励志了，令我辈汗颜。

遥想二十多年前，在我家乡文联组织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，我有幸见到了精神矍铄的邓先生。先生那时年近七十，穿一件白色粗布对襟褂子、一条浅蓝色牛仔裤，脚上穿一双黑色老北京布鞋，走起路来步履轻快，满面红光，一眼看去倒像是个武林高手。他说起自己早年的从军经历，甚或曾经在日本做华工所忍受的磨难，依然谈笑自若，轻描淡写仿佛过眼云烟。而聊起文学来又驾轻就熟，见解独到。

大约是去年吧，我写过一篇有关邓先生和林斤澜先生的文坛趣事随笔，偏巧与北京作家陈喜儒先生的一篇散文发在同一份报纸上。陈先生看到报纸就把我的小文剪贴下来送给邓先生看，他们过去是中国作协的老同事，私交甚好。顺便提一提，当年邓先生能来我的家乡小城参加文学创作研讨活动，就是得益于陈先生的联络和引荐，因为陈先生是我们地地道道的老乡。

那天在邓先生家，陈先生还拍了一张邓先生的照片并发给我。因为有过一面之缘，邓先生读了我的小说，就想起了二十年前我们相识的往事。从照片上看，老先生依然很精神，还穿了一件海军衫！只是须发皆白，想来先生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了。我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。

在邓先生面前，我当然是小字辈，对先生，一向以尊长敬之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眨眼，我也正式退休了。六十而退，我不再有信心和勇气去“立”什么，更何况活了大半辈子一直都没能“立”起来。说立功吧，我素来思想落后，如今又笨手笨脚；说立德吧，情操又一向平庸，甚至不知高尚为何物；说立言呢，早已拙嘴钝舌、耳背眼花，什么事物都看不清了，也不想拿那些所谓观点去跟别人较劲。六十而退，我想还是退回自己内心的好，读点闲书以养性，对影三人自怡情；世事看淡又看淡，努力做个清静人。六十而退，就退回大自然中，偶遇高山可沉默，欣逢溪水或轻吟。这样的退，于自己而言，也许是进呢。



人世间